

楊樹達訃告研究

卞仁海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Subsidized by Shenzhen University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Scholarly Monographs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后期
资助项目“杨树达训诂研究（GD11HZW01）”成果

楊
樹
達
訓
詁
研
究

范汕題



卞仁海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廣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树达训诂研究/卞仁海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306 - 04971 - 1

I. ①杨… II. ①卞… III. ①训诂—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6978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陆 峥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王 璞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20 印张 35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一

王彦坤

卞君仁海曩从余游，读硕攻博，六载于兹。今其书《杨树达训诂研究》行将付梓，索序，余欣然以允之。

卞君此书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研究遇夫先生训诂，条分缕析，面面俱到，要言不烦，甚有理致。而余以为尤值得称道者，有数事焉：

其一，是书以现代训诂名家杨遇夫之著作为研究对象，实开训诂学研究之新篇章。长期以来，训诂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若干名著大家，非《尔雅》、《方言》，即许慎、郑玄；非金坛高邮，即俞孙章黄。其研究颇多重复，徒费精神；犹舐肉尽之骨，滋味无多。又舍近而求远，于近、现代，章黄之外，几为遗忘矣。然近、现代处语言学转型之期，西学东渐，催生科学新方法，甲金发现，资助研究新材料，此期学人之训诂成就，比之以往，实不遑多让也。意以为，若沈兼士之于右文研究，于省吾之用甲金释典籍，张相之诗词曲语辞考释，蒋礼鸿之敦煌变文字义考释，高亨、杨伯峻、王利器之古籍校注等，也均有研究之必要，然至今皆但见单篇论文偶而及之，若卞君之作专著研究者，不说绝无仅有，也属凤毛麟角矣。

其二，是书于杨遇夫之训诂，研究全面，考察细密，是真正意义上之全面、系统研究。书中除着重探讨杨遇夫语言观及其在训诂中之应用外，又兼及学术背景之介绍，与时贤相关研究之比较，以及遇夫训诂在诸多方面之应用、成就与局限。其述遇夫语言观及其在训诂中之应用，则又分为文字形义观、音义观、语义观、语法修辞观等，下各依据具体情况再细分出若干训诂应用节目，可谓面面俱到，巨细无遗。此点，相信读者翻开卷首目录，即当体会其“全面细密”，进而通读全文，则体会益深。

其三，是书设置了大量的表格与图示，反映了作者之巧妙用心，也成为此书突出亮点之一。表格、图示的最大好处是形象直观，信息量大却节省篇幅。卞君深谙此道，运用得心应手，堪称精到。如第三章关于杨氏“形义密合”

说之图示，分散多处、略嫌繁复之文字片断，一旦变为图示，便简明易懂，一目了然。又如第四章第一节，将杨氏《积微居小学述林》中45篇训释形声字语源文章的内容通过表格予以显示，既无连篇累牍叙述之烦，又使读者对于相关问题有一全面了解，可谓其美两全。文中论证，往往采用举例性个案详述与穷尽性表格简示相结合之做法，有点有面，相得益彰。

其四，是书研究遇夫训诂而不局限于遇夫，又联系同时代治训诂之章、黄、沈三大家作颇为细腻之比较，两两比较之下，不但遇夫训诂之特色看得更为清楚，章、黄、沈三家之得失也显明矣。如云：“章氏是有名的宗许大师，其语源研究完全迷信《说文》；杨氏则‘批判接受’”；“杨氏《论丛》、《述林》利用形声字系联了大量的同源词，一字一义，旁征博引，注重实证；而沈氏则注重系统归纳和总结，在理论推阐上更胜一筹”；“形音义三者，黄氏主音，说：‘三者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杨氏则主义，云：‘夫文字之生也，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三事递衍，而义为之主’”。凡此所论，皆从具体之比较中得来，信而有征，其于治训诂学史者，也不无参考之意义焉。

其五，是书分析客观，立论公允，当仁不让，勇气可嘉，也颇值得称道。时人毛病，每有拔高研究对象之嫌，研究张三则虚褒张三，研究李四则抬举李四；至其短，则视而不见。卞君此书无此。其于杨氏，赞有加矣，然皆据实，不为空誉。又立“局限与商榷”专节，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指摘其误。是是非非，立论公允，不仅对于杨氏，其于章、黄、沈氏之评判，亦复如此。又是书广引先哲时贤著述以为佐证，推崇之意，溢于言表。然至可商之处，仍直陈己见，绝不回护，无论其为当代大家抑为己之师长也。备见文中，毋庸细述。

然卞君此书犹有可提高者，个别说法，尚须推敲。如第五章第一节中关于“反训词”之定义，称“反训词是由于语义的发展变化从而使一个词具有两个相反、相对的意义”，即可商。一个词有可能“具有两个相反、相对的意义”么？或者说，“两个相反、相对的意义”有可能是一个词么？显然这种说法并不妥当。第六章第二节关于“互文为训”的定义，称“互文是指在某些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句子或词组里，处于对应位置的词，彼此可以相互解释”，亦可商榷。其下曰：“简单地说，就是上文里省了在下文出现的词，下文里省了在上文出现的词，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即俞樾所谓‘参互见义’；杨树达谓之‘参互言之以相备耳’。”既然是“上文里省了在下文出现的词，下文里省了在上文出现的词”，就不是“处于对应位置的词，彼此可以相互解释”的

问题了。

然此皆吹毛求疵之类，无损于大雅也。要之，以此书而称卞君为杨氏之功臣、诤友，不为过也。

犹记得十载之前卞君负笈暨南园时，雄姿英发，壮志冲霄，颇有狷傲之气。今读此书，豪气犹存，而多了几分成熟与睿智，是诚可喜可贺。卞君学术前程光明，可预期也。

是为序。

2013年11月7日于暨南园无名室

序 二

杨逢彬

先祖杨树达先生是20世纪我国最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之一。30年前，余编纂《积微居友朋书札》，中有陈寅恪先生函六通，其第一通即谓：“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其第六通又谓：“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①顾颉刚先生在《近世治古典之数巨子》^②一文中认为，近三百年来“治古典”成就最大者当属王念孙、王国维与杨树达先生。环顾宇内，硕学鸿儒，均有传记行世，独杨树达先生无之，学者引以为憾。二十年前，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刊行《国学大师丛书》，主其事者瞩目于余。而其时正从郭锡良先生游，未暇旁骛。其后著述之不暇，何有于此乎，故逡巡至今。去岁启真馆曾与余接洽，撰写一与先祖生平有关之小册，或将于今明两年发行；乃《东方早报》书评版《文汇报》笔会《新民晚报》夜光杯等所刊余文之汇集，非正式之传记也，更遑论先祖之训诂研究（台湾有研究先祖训诂之硕士论文）。今者卞仁海君著《杨树达训诂研究》一书，远道索序于余，余愧于学植荒疏，恐无以副其望，虽然，一倾积愆可耳。

近年来文史哲领域似乎有一种带有倾向性的意见，大约谓今世学人不足以望昔年大师项背，有一三卷本畅销书封面上的一行字可以总结这一意见：“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如果所谓大师的标准，包括学术风范人格魅力等等，在下完全同意。如果仅就学术而言，我则有所保留。不错，20世纪是中国传统学问与西学接轨的发轫期，大师们筚路蓝缕，开创山林，浇灌出一片新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处女地的开拓者是幸运的，今人及后人要想在学术史上复制他们的辉煌瞠乎其难；也即，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了一大截，我们站

① 杨逢彬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3、98页。

② 顾颉刚：《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312页。

在他们的肩膀上也许只能向上推进寻尺。但这毕竟是站在他们的肩上，看得比他们远，而不是依然在地上仰望他们。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仰望者之所以仍踌躇不前，恐怕是治学门径的问题。

拿以上认识为前提，既然要对杨树达先生训诂研究做出总结，那么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杨树达先生的训诂研究为何是同时代做得最好的？第二，我们今天要怎样做，才能比杨树达先生做得更好？回答好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可以肯定地说，卞仁海君的《杨树达训诂研究》，较好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杨树达先生的训诂研究为何是同时代做得最好的？我们知道，任何学问要取得新进展，端赖新方法的运用。如前所述，顾颉刚先生认为，近三百年来治古典者以王念孙父子、王国维、杨树达最为精湛。我们知道，王国维先生的卓越，“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成功运用是至为关键的。我们先撇开不谈。清代小学如日中天，其成就的取得，论者以为得益于古音学的巨大进展，学者可以突破字形的束缚，因声求义。那么，同样得益于古音学的进展，高邮王氏父子为何高出侪辈呢？王氏父子的独步千古，除了纯熟运用古音学，还采用了哪种方法呢？对此，杨树达先生回答说：“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征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乎！虚实交会，此王氏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也。”^① 先生又说：“其书虽未能成为系统整然之语法学，而语法学材料之丰富与精当，固未有过之者也。盖王氏父子文法观念之深，确为古人所未有，故其说多犁然有当于人心也。”^② 至于杨树达先生成功的关键，则是自觉走文法训诂相结合的道路。只要看一看先生平生最为得意的两例考释，大约就不会怀疑上述结论。第一例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之《〈诗〉“于以采蘋”解》，第二例为既见于《汉书窥管》正文卷七又见于《自序》之释“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条。

第一例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史上最有趣的佳话之一，是杨树达先生与胡适、钱玄同讨论《诗经·召风·于以采蘋》的结晶；同时见于上述三位学者的著作，这是绝无仅有的。杨树达先生认为“于以采蘋”之“以”当训为

① 杨树达：《词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杨树达：《中国语法学小史》，载《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31页。

“何”，因为“以”假借为“台”，金文台、以二字常通作，而《尚书》“如台”，《史记·殷本纪》都译作“奈何”。但胡适提出，疑问代词作宾语，依先秦文献惯例当在动词、介词之前，而读“于以”为“于何”，与此一惯例不符。杨树达先生进而指出，此一惯例有许多例外，并举《小雅·小宛》“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小雅·白驹》“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所谓伊人，于焉嘉客”《正月》“哀我人斯，于何从禄”《十月之交》：“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菀柳》：“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小旻》“我视谋犹，伊于胡底”为例^①，可谓信而有征。在《积微翁回忆录》之1922年9月15日、9月23日、1936年5月14日、1944年5月18日，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1922年9月15日所记云：“不惟可以答胡君之难，竟于无意中发现一文法通则之例外，喜出望外，不觉手舞足蹈。”9月23日所记又云：“适之得余书，遂弃其前说而从余议……胡君闻义则服之美，世所罕见。”1944年5月18日所记则是记录老友曹孟其贺先生60诞辰的4首绝句，其中一句为“‘于以’‘终风’同一妙”，先生评论道：“以余之‘于以’说与高邮之‘终风’并论，为余抬高身分不少矣。”^②从此不难看出，语法学家之治训诂，自然不同凡响。

陈寅恪先生又称誉杨树达先生为“汉圣”，第二例则是《汉书窥管》中的最为得意之作：

《金日磾传》：“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王念孙曰：“‘车’下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脱之。《百官表》云：‘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艺文类聚·人部》十七《御览·仪式部》三引此并作‘赏为奉车都尉，建驸马都尉’。”

树达按，此因下“都尉”二字省。《艺文》《御览》引有“都尉”二字，乃二书补足之耳。举《儒林传》《王莽传》及《三国志·魏志·董卓传》之类似文字为证。《儒林传》云：“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弘农”“河内”下各省“太守”二字。《王莽传》云：“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琅琊左咸为讲《春秋》，颖川满昌为讲《诗》，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沛郡陈咸为讲《礼》，崔发为讲《乐》祭酒。”讲《春秋》、

^① 杨树达：《〈诗〉“于以采芣”解》，载《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09-210页。

^②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115、213页。

讲《诗》、讲《易》、讲《书》、讲《礼》下各当有“祭酒”二字，因下“讲《乐》祭酒”字而省，与此句例正同。又《翟方进传》云：“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律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刘歆”下省“师”字，与此亦略同。”《魏志·董卓传》云：“以暹为征东，才为征西，乐为征北将军。”“征东”“征西”下各省“将军”二字，亦袭此句法。王说知其常而不知其变也。^①

这一例似乎纯粹训诂的面貌示人，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高邮王氏最为人称许的、历来公认为词句训释巅峰之作的两个成功范例。前一篇考证的是《诗经·邶风·终风》，后一篇考证的是《老子》第三十一章。

家大人曰：“《终风篇》：‘终风且暴。’《毛诗》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燕燕》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北门》曰：‘终窶且贫，莫知我艰。’《小雅·伐木》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商颂·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正月》曰：‘终其永怀，又窘阴雨。’‘终’字皆当训为‘既’。”^②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又见《经传释词》，文字稍有不同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释文》：“佳，善也。”河上云：“饰也。”念孙案，“善”“饰”二训皆于义未安。……今按“佳”当训“隹”，字之误也。隹，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维”）。唯兵为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上言“夫唯”，下言“故”，文义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争，故无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皆其证也。古钟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③

——王念孙：《读书杂志·志余上》

让我们看看高邮王氏和杨树达先生具体是如何做的。他们固然十分注意采

① 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35页。

②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③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0页。

纳故训，采纳因声求义的办法，以及采纳辨析字形，特别是通过出土文献辨析字形的办法。但是，综观以上三篇，其中起关键作用而不可或缺的是，征引大量的书证，特别是与被证词句同一结构同一句式的书证。其原理，无非是通过综合归纳抽绎这些书证，考察疑难词句所出现的上下文条件。这用语法术语说，就是考察“分布”。其原理也可以简单归纳为：意义不同，分布也不同。也即，不同的两个词，分布一般不相同；一个词的各个义位，其分布不相同。一个词内部某意义引申出另一意义，分布一般要改变，即后一意义的分布一般与前一意义有所不同。一个词分化为两个或多个词，分布一般要改变，即这两个或几个词分布一般不同。何谓“分布”？它一是指词在句中所占据的语法位置，也即词所充当的句法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等；二是指词的结合能力，即该词修饰何词，该词被何词修饰，等等。因此，要想知道句中某字到底是那个词（一字可以是多个词），考察其分布就可以了；要想知道句中某词是其本义和若干引申义中的哪一意义，考察其分布就可以了。既然任一词义、任一词、任一句法结构都有一定的上下文条件（也即分布）限制着，考察这些条件就是求得诂诂的不二法门。以上三篇就是考察上下文条件（分布）的成功范例。反之，不考察上下文条件，而仅仅用形训、声训、义训的办法，说某与某通，某读为某，这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可能性是无穷多的。只有考察词义、词、句法结构出现的条件，才是求得近于必然的正确途径。

科学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原理上的简洁性，这是指科学理论的简单形式与其深广内涵的统一。看似纷繁复杂的训诂之学，用现代语言学加以观照，就变得豁然开朗，简单明了。可见普通语言学的掌握，是当今训诂学者的基本功。

在这里，我们想重点强调的，一是，语法，是语言的组织结构；语法学，是探索语言组织结构规律的科学。不能了解语言组织结构规律，精读古书，正确地解释古今见仁见智的疑难词句是不可能的。二是，将重点放在考察分布，是提高训诂实践中最重要一环——训释古今仁智互见的疑难词语的水平的不二法门。其具体步骤就是广泛收集同一时期同一结构或同一句式的例句，加以综合归纳，抽绎出其中规律。

至此，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即我们今天要怎样做，才能比杨树达先生做得更好，似乎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

今天汉语语言学界对古代汉语规律的认识与掌握，较之以往已经有了大大提高。将这些规律，用于古代典籍，持之以恒，必将取得比杨树达先生等老一代学者更大的成绩。以笔者比较熟知的而言，与训诂相关的，至少在古书中古

今见仁见智的疑难词句，以及虚词领域，今人可以取得较之前辈学者更大的成绩。关于后者，可以参见笔者的导师郭锡良先生的《汉语史论集》中关于古汉语虚词的几篇文章^①。前者则可见下文。但取得更大成绩的前提是，做这些研究工作的学者，必须从申报、报销、结项等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既放眼世界，汲取新方法新成果，又沉潜斗室，板凳坐得十年冷。

下面举一个考证实例来说明。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论语·公冶长》

“未知，焉得仁”的通常解读，不拟赘言。但《经典释文·论语音义》此章“未知”下注以“如字，郑音‘智’”，即郑玄读作“智”。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此章也作“未智焉得仁”。另外，《论衡·问孔》中王充在引用此章后评论道：“智与仁，不相干也。……智者未必仁，……子文智蔽于子玉，其仁何毁？谓仁，焉得不可？”可见王充和郑玄一样，将“知”读为“智”。这里的事实依据是，子文举子玉自代，结果“败而丧其众”，是为不智。又《里仁》：“择不处仁，焉得知？”但郑玄、王充有这样的解读，未必就一定正确。确定解读是否正确主要依赖于前文所说的对上下文条件的考察。

1. 我们全面调查了《论语》（1例）《左传》（14例）《国语》（2例）《孟子》（2例）《老子》（1例）《庄子》（12例）《墨子》（10例）《管子》（5例）《荀子》（3例）《吕氏春秋》（8例）《韩非子》（8例）11部古籍中的全部66例“未知”；这66例中，除了《荀子》中的2例较为特殊外，其余64例“未知”全都带有宾语。由此可知，本章的“未知”应该读为“未智”。

2. “焉得”经常处于因果、条件复句的最后一从句。我们在《论语》（2例）《左传》（13例）《国语》（3例）《孟子》（2例）《管子》（2例）《吕氏春秋》（1例）《韩非子》（10例）7部古籍中找到33例“焉得”，除《孟子·

^① 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滕文公下》1例外，其余32例“焉得”全部处于因果、条件复句的后一从句。由于“知”是及物感知动词，“未知”通常要带宾语；“智”是性质形容词+抽象名词的兼类词，不带宾语；而两者字形可通，所以此章的“知”应读作“智”。又由于“焉得”往往处于因果、条件复句的后一从句，所以，我们认为“未知，焉得仁”应读为“未智，焉得仁”，是个因果复句（据子文举子玉自代，“败而丧其众”可知）。而且，当回答他人“我不知道”时，从《论语》时代直到战国末年，一般都作“不知也”或“不知”，从未见答以“未知”的。可见，这5个字只能译作“他未能做到‘智’，怎么能够算‘仁’呢”。^①

我们在即将出版的《论语新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中，作了一百五六十例这样的考证，其中与上文所引处于同一水平的，也有二三十例。当然，这绝不是想要妄言，就凭这一部小册子，就将“赶上”或“超越”高邮二王和杨树达先生；只是想表明这样的意思，只有像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假以时日，我们的后人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取得比以高邮二王和杨树达先生为代表的清代和民国大师更为辉煌的成就。

今即随机撷取卞君书中的一例，再来说明我们是如何考察分布的：

一零页 四行 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一四〕帜皆赤，注〔一四〕原在「鼓」字下，明颜读“衅鼓”句绝。吴仁杰据封禅书“祠蚩尤，衅鼓旗”之文，以为“旗”字当属上句。王先谦、杨树达都说吴读是。

上文引自第八章《杨树达之训诂在诸多方面的应用》之第一节《古籍整理及阅读》下之第四点《标点》。“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之文见于《高帝纪》，又见于《史记·高祖本纪》。

到底应该断作“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还是“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我们以为后者较为可信。因为：

1. 《汉书》中，除上例待考察外，“鼓旗”连文者共5见：“祀蚩尤，衅鼓旗。”（《郊祀志》）“于是信、张耳弃鼓旗，走水上军，复疾战。赵空壁争汉鼓旗，逐信、耳。”（《韩彭英卢吴传》）“渔阳太守解、校尉敢皆获鼓旗，赐爵关内侯。”（《卫青霍去病传》）“建天子鼓旗，收斩之。”（《王莽传》）

^① 杨逢彬：《论语新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旗帜”连文者亦5见：“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偃旗帜，迟明，围宛城三匝。”（《高帝纪上》）“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同上）“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高帝纪下》）“即驰入赵壁，皆拔赵旗帜，立汉赤帜二千。”（《韩彭英卢吴传》）“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张陈王周传》）此外，除先秦典籍外，《后汉书·窦融列传》亦有“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鰐”，说明在从先秦以迄刘宋的语言中，可以有“衅鼓”这一组合，并非一定必须“衅鼓旗”。这样看来，似乎两种断法都有理。但是，且慢。如断作“衅鼓旗。帜皆赤”，则是“帜”作为一词单用；如断作“衅鼓。旗帜皆赤”，则是“帜”与“旗”组成联合词组。如前所言，“衅鼓”可以成为词组，而不必非得“衅鼓旗”，然则，考察“帜”在当时语言中是否可以作为一词单用，将成为至为关键的证据。

《汉书》中，除“旗帜”连文者亦5见外，“帜”还出现了7次：

“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葺山而望超军。……若疾入，拔赵帜，立汉帜。……即驰入赵壁，皆拔赵旗帜，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能得信、耳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韩彭英卢吴传》）“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李广苏建传》）“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傅常郑甘陈段传》）“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王莽传》）

以上7例“帜”，除《李广苏建传》1例外，其余6例都是“帜”与其他词组成双音词组，其中4偏正词组（赤帜3，汉帜1），2例联合词组（幡帜、徽帜各1），加上5例联合词组“旗帜”，共11例。仅仅1例是“帜”单用的，从韵律上看，似乎也可将“为帜”视为一双音动宾词组。考虑到考察样本太少，不妨加入《史记》《三国志》《后汉书》一并考察。

《史记》中“帜”共9见，全部处于双音词组中，其中联合结构的“旗帜”4见，偏正结构的“赤帜”4见，偏正结构的“赵帜”1见。当然，有些文例与《汉书》是重复的。

《三国志》“帜”仅2见，“旗帜”1见，“表帜”1见，都是双音词组。

《后汉书》中“帜”共11见，除《虞傅盖臧列传》1例外，其余10例都是“帜”与其他词组成双音联合词组（旗帜5、幡帜3、旌帜、标帜各1）。而见于《虞傅盖臧列传》的“佣作贼衣，以采縵缝其裾为帜”，也是“为帜”连文。上文说“似乎也可将‘为帜’视为一双音动宾词组”，也是虑及到此

例的。

总之，以上4部典籍中，除2例“为帜”（可以从韵律上解释）外，其余32例都是“帜”与其他词组成的双音词组，而且“帜”都是该双音词组的后一音节，无一例外（如将“为帜”视为动宾词组，也不例外）。“旗帜”正是这样的双音词组。可见，标点为“旗帜皆赤”较为可据。另外，将我们考察的对象标点为“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即使从韵律上看，也比标点为“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为和谐，这也正是下面一点要论及的。

2. 从“皆”前后音节的搭配看，“帜皆赤”出现概率极低。《汉书》中表示“都”的“皆”字多达2000多例，其前后都为单音节即“~皆~”的极为罕见，我们只见到《张耳陈馥传》中一例：“乃使五千人令张廩、陈释先尝秦军，至皆没。”一般而言，如果“皆”的一边一定有一单音节的话，则其另一边必须是双音节或双音节以上，即要么为“~皆~~”，要么为“~~皆~”。其原因大约还是与韵律有关。兹各略举数例：“民皆自宁”（《高帝纪》）“齐皆降楚”（同上）“兵皆縞素”（同上）“军皆左袒”（《高后纪》）“佗皆勿坐”（《宣帝纪》）“秩皆千石”（《百官公卿表》）“课皆疏阔”（《律历志上》）“宜皆勿修”（《郊祀志下》）以上为“~皆~~”者。

以下为“~~皆~”者：“诸侯皆附”（《高帝纪》）“群臣皆伏”（《文帝纪》）“众功皆美”（《律历志上》）“其事皆禁”（《郊祀志上》）“野鸡皆雉”（《郊祀志下》）“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同上）

可见，“帜皆赤”这样的“~皆~”句式出现概率是极低的，而“旗帜皆赤”这样的“~~皆~”句式出现概率是较高的。

鉴于从汉初到刘宋时期，“帜”一般不单用而须与其他词组成“~帜”词组，又鉴于“~皆~”句式出现概率极低而“~~皆~”句式出现概率较高，我们以为《汉书》中的这一例宜标点为“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旗帜皆赤”与《高帝纪下》之“旗帜上赤”（旗帜以赤色为上）结构是一样的。由是可知，中华书局版《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之标点为“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是不大妥当的。

另外，标点为“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则与颜师古注相合，也符合我们提出的“从古原则”（详见拙著《论语新译注·导言》的《我们的具体做法》部分）。

或谓此例之标点，乃据《封禅书》“祠蚩尤，衅鼓旗”之文，而《郊祀志》（《史记》则为《封禅书》）与《高帝纪》所载乃是一件事情，不至于—

为“衅鼓”，一为“衅鼓旗”。我们以为，历史事实之考量虽较为重要，却毕竟是语言系统之外的证据，不比语言系统之内的证据来得可靠，后者才是必须优先考量的；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尤其应当如此。且一事两处记载，文字互有参差，实属正常。即以《高帝纪》与《郊祀志》的这两段文字为例说明之。《高帝纪》：“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郊祀志》（《封禅书》）：“祀蚩尤，衅鼓旗。”前者提到“黄帝”，提到“（旗）帜皆赤”，而后者无之，甚至连“黄帝”也略去了。由是可知前者为“衅鼓”，后者为“衅鼓旗”，也属正常，不足以此例彼。且“祠蚩尤，衅鼓旗”，两两三字成文，无“旗”字则不响；“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因有一“而”字，已满足三字的条件，若单从音律上考虑，不必有那一“旗”字。

从这随机的一例考释，我们有以下3点认识：

1. 我们不能苛责前辈大师。即使誉为“汉圣”，《汉书》能倒背如流的杨树达先生，也没有我们今天的便利，十指一敲，海量语料转瞬即到眼前。2. 我们今天能够做得比较精确，诚如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所总结的“六纲五条例”之第一纲所揭示的，乃是拜时代——E时代，语言学取得巨大进展的时代——之所赐。3. 在E时代，语言学取得巨大进展的时代，不尽量利用时代所带来的便利，不站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继续奋力登攀，而是匍匐在前辈大师脚下，笼罩在前辈大师的光环中裹足不前，而以恪守师说自饰，这样做，不是当今学人应有的态度。

粗略地说，今人如能扬长避短，虽然文献训诂水准难以企及当年的大师，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有电脑技术的运用，也能做出与大师同样精湛的考据成果，而又避免他们的失误。今人聪明才智不在古人之下，而科学昌明，远过昔年。所以，做出超越大师的成果，实在是必然趋势。只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必须踏踏实实地起步。

如何起步呢？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就是总结大师何以成功的经验，总结他们失误的教训。

卞仁海君的《杨树达训诂研究》，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展卷读之，卞君在这两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

首先，一方面，卞君在用一章篇幅分析杨树达先生训诂的学术背景之后，用四章篇幅分别分析了杨树达先生的文字观、音义观、语义观以及语法修辞观在训诂上的应用，每一章下，又划分了好几节，每一节下又划分细类，条分缕析，曲径幽微。卞君运用现代语言知识，深思密察，去粗取精，对杨树达先生的训诂研究加以归纳总结和抽绎，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这样，就把博大而似

乎漫无涯涘的杨氏学串联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了，从而有利于学者了解杨树达先生学说的精髓。同时，卞君横向地比较了杨树达先生和章太炎、沈兼士以及黄侃的训诂研究，列出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异同，又不啻为一部 20 世纪前期的简明训诂学史。另一方面，在第九章《杨树达的训诂成就和局限》第一节，卞君说：

杨氏训诂，根于传统，贵在纳新，“温故知新”一语，可以概括其训诂特色。训诂之学，绵延千年，治之者大都徘徊于乾嘉高峰之前，仅因两端：或无新材料，或缺新方法。段王以声为义，得益于归纳之法；虚实交会，则因其善考文例（比较之法）。学问之事，无以承传，不得创新：段王之学，杨氏承之。正当传统训诂囿于材料似乎山穷水尽之时，卜辞大出，甲金之学勃兴；西学东渐，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介入。缘乎此，千年训诂再现生机。杨氏因应时势，广稽甲骨金石于训诂，以探求文字语源为依归，从而取得了超乎段王的训诂成就。“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杨氏之谓也。

这两百多字的总结，可谓恰到好处。好就好在指出了杨树达先生之“因应时势”，吸纳新知，这与我在这篇佛头着粪的所谓序言中的前文所言，是一致的。

如此，既有全面深入的剖析、归纳，又有贯彻始终的一条红线，领挈以全裘振，纲举而万目张。

其次，在第七章第一节第三部分《共有的局限》和第九章第二节《局限与商榷》中，卞君又颇能指出杨树达先生的不足。卞君所引唐钰明先生的话：“判断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最主要的是看他作出了多少建树，而不在于他有多少疏失。”于我心有戚戚焉。记得在十三四岁时读先祖父的《释尾》（手头无书，大约见于《文字形义学》），引述达尔文人猿进化学说后猜测大约造字时人尾尚未退化云。当时我想，人尾退化，大约在若干万年以前，造字则在数千年前。可见大师之误，在所难免，而往往与其建树成正比。杨树达先生在论述郭沫若治甲金文时所说“郭君鼎堂神识敏锐，创建独多。顾其书善者高出青云，次者或下沦九地。如此剽悍之将，性喜陷阵，搴旗斩将，每建奇功；而覆车溃众，时时不免。……瑕瑜杂见，固其所也”云云，有时也适合杨树达先生本人。

卞君的辩证，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宏观的如：“语源同”含义辨正，先入为主难免臆说，用文字的方法研究语源，仍拘于“右文”，等等，都